经典作家

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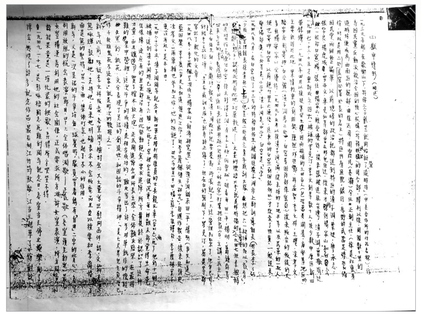
罗广斌

诞辰一百周年

罗广斌，重庆忠县人，当代作家。1947年参与革命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于参加革命活动，罗广斌被捕入狱。在狱中，江竹筠、陈然等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出狱，根据狱中经历，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杨益言进一步细读历史文献、深挖人物精神内核，多次修改打磨文稿，于1961年发表长篇小说《红岩》。2019年，《红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今年是罗广斌诞辰100周年，本刊特邀专家学者皮钧、张玉清、钱振文撰文，追忆“红岩精神”，致敬红色经典。 ——编 者

一九七八年，舞台艺术片《江姐》上映。闫肃编剧，黄祖模、沈葵等演，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罗广斌手稿复印件 钱振文提供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该片改编自小说《红岩》，周皓编剧，水华导演，于蓝饰演江姐，赵丹饰演许云峰，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红岩》：一部经历三次升华的红色经典

□皮 钧

深入剖析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与国家叙事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以史为鉴、把握当下、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起的文化使命。

在罗广斌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以《红岩》为例，探讨新中国叙事的内在逻辑、时代特征与文化价值，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提供借鉴。虽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个人感受的产物，但只有那些汇聚了时代记忆的文学，才能够成为经典。无论多么优秀的劳观者，都不如躬身入局的人的感受真切。知行合一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既拿笔又拿枪的战士。理论战线是如此，文艺战线也是如此。作家参与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张力和影响力。

长篇小说《红岩》对当代中国的几代读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毫无疑问，它也载入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史册。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对新中国历史的叙说，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和审美意识体系，反映了人们对新中国丰富多彩的艺术想象。

1961年12月，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迄今经过多次印刷，总销量已超过1500万册，成为中国文学出版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出版奇迹。这背后有着深层的创作密码。《红岩》是一部经历了三次升华的经典：由个人感受向时代记忆升华，由历史事件向文学经典升华，由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

第一次升华是由个人感受向时代记忆升华。众所周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曾被囚禁于重庆集中营，是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罗广斌25岁，杨益言24岁。当时还有一位参与者刘德彬也是渣滓洞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在共青团重庆市委的要求下，大力宣传重庆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三人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因此，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便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回忆录写出来。1950年6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在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众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切期盼能读到更多的有关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故而，他们三人又撰写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可以说，他们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光辉岁月，是小说《红岩》最重要的创作基石。他们作为亲历者，逐渐成为那个时代共同记忆的讲述者。杨益言曾在1979年撰文说：“报刊编辑部曾多次要我们谈谈创作情况，我们都没有照办，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总觉得，正如许多同志知道的，严格说来，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不是我们，而是无数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记录整理工作。”

第二次升华是由历史事件向文学经典升华。1956年，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到四川出差时，听了几位年轻人讲的故事，感到非常好，就鼓励他们把故事写成小说。除了朱语今，还有四川省文联兼作协主席沙汀、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张羽等也给出了很重要的意见，鼓励作者们“为了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讲述亲历的故事是一回事，写成文学作品又是另一回事。罗广斌、杨益言后来谈到，他们在创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首先，从重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它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要把普通的生活变成作品，需要有一个再认识、再创作的过程，即是说，需要按照小说的需要，有一个集中、概括、典型化的过程。但我们一进入创作实践，便被创作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所困没。除了创作愿望和创作实践之间总是觉得矛盾重重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具体的矛盾。

这个小说是着重写狱中斗争的，又是写共产党人在狱中斗争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新课题，这不能不迫使我们从古今历史、从国内外写监狱斗争的作品中去对比分析，寻找它的特殊性，以及怎样在这一作品中去表现它。小说的背景是解放战争年代，但不能既离党的整个斗争而孤立地加以描写，也即是说，在写监狱内部党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兼顾我们党在狱外的整个斗争。这一点，我们过去基本上就没有想过，更缺少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同时，从作品典型化的需要出发，除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补充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比如，对狱特的认识问题。我们在集中营里都和敌特斗争过，解放以后在“镇反”中也和敌特多次打过交道。我们优恨敌人，见过不少敌人，但细细一想，便觉得并不真正理解敌人，要描写他们，还得重新学习。

我们先后提审了一批在押特务，翻看了200多万字的敌特档案材料，特别是查看了一个老牌特务连续十多年的日记以后，才对敌特那一套思想感情、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地了解，才终于觉得可以写他们了。又比如，我们发现写共产党人监狱斗争的作品太少，可供我们参考的东西不多。

小说人物，特别是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孕育时间就更长。那些在生活中曾经给了我们强烈、深刻印象的人和事，在写作中自然会强烈地影响我们，要求我们去表现。正因为这样，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从当年重庆集中营激烈的敌我斗争中开始孕育，在参加解放的口头宣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许多细节、语言、人物、故事，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历史上实有过的。但是，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往往不那么集中，作为文艺作品来要求，则需要更集中更典型。小说《红岩》，同样不可免地经历过这样一个集中、补充、再创造的过程。比如小说着重描写的英雄人物之一的江雪琴，是以英勇插往在“中美合作所”的江竹筠烈士作为生活原型塑造的。她在狱中的表现，曾经给了敌中叛友，也给我们以极深刻的教育。罗广斌同志入党，也是她介绍的。我们向青少年口头宣传时，曾经成百次地讲过她。但是，一当我们把她当作小说人物江雪琴来塑造时，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还需要集中、补充、丰富。江竹筠烈士的精神状态以及她在刑讯、就义前后的细节、语言，我们都尽可能地移植到小说人物江雪琴身上去了，但还显得单薄，于是，又给她增添了下乡、狱中绣红旗等情节，增添了她身边的一批人物关系。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上，体现了被英雄人物感动了的作者和编辑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英雄们的思维和情感。特别是在江姐上山时的感情变化的描写中，作了必要的增补和发展。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张羽建议作者补写的重点是她在看到爱人彭松涛的头颅和布告时的悲痛感情，以及见到双枪老太婆后的感情交流，目的是突出她知道老彭牺牲后的感情激荡，双枪老太婆见到江姐后对战友的负疚和关怀。在那个年代写小说有个清规戒律：英雄是不能哭的。《红岩》中却让双枪老太婆狠直地说出：“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她把千言万语凝聚成有力的一句话：“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编辑建议加在她身上表达的感情，是编辑十年前访问中央苏区时，闽赣边的革命老妈妈留下的不灭的印象，编辑深信也符合双枪老太婆的感情。作者接受了编辑的意图。这种从血的代价中闹发的阶级情宣，通过她们的感情交流，也把读者带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形成了文学的典型形象。

第三次升华是从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尽管有了这么大的进步，而且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罗广斌、杨益言总觉得结构不起来，感到缺少了什么，又说不出来。他们从这批稿页中选留了30多万字，作为初作品种印出来，送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老作家马识途看了这本暂名为《禁锢的世界》的初稿说，作者“好像还是坐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写的”。这个意见一针见血、十分中肯——马识途、沙汀等老作家也多次主动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但是作者当时却一点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作者后来回忆：排印稿送走以后，实际上，我们早已弄得精疲力尽，不想再改下去了。从他们从讲故事转向文学创作，已经过去三年了。几个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热情约作者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他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两位作者终于成行。没有想到，到北京以后，却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两位作者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小说里缺少的重要东西找到了：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了若指掌、指挥若定，这一下，罗广斌、杨益言二人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尽管当时展览馆严格规定不许拍照，不许抄录，但罗广斌、杨益言二人还是站在玻璃橱窗前，把电报稿择要背诵了下来，然后走到休息处，再默到自己的本子上。罗广斌一再兴奋地说“看见了这些电报手稿，就好像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

1960年秋起，作者重新结构、从头再写时，就觉得顺当得多，心里踏实多了。196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当时他们看过的许多电报都收录进了《毛选》。对作者们来说，是思想上一次大的解放，对这部小说主题、结构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确定阙道隆、王维玲、张羽等三位同志为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编辑看到这次稿以后认为，小说面貌大变，还有潜力可挖，要作者再到北京修改定稿。

至此，《红岩》中所描写的监狱斗争就成为了当时整个解放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展示了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党的政策的发展变化。小说着力塑造了一个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秘密监狱的特殊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战斗集体。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直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敢于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并取得全国胜利的党。这样所有逻辑都贯通了，作品由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真实地再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正如罗广斌后来谈创作思想时所一语道破的那样：“材料多少，都是量的变化；而思想高低，才起了质的变化。”

除了作者的升华，出版社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出版社编辑必须支持作者的这些转变，推动上述升华，这才是出版社的价值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重要的创举，就是将个性化的创作与社会化生产密切结合，把个人感受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把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作家队伍与专业化的编辑出版队伍紧密结合，在短时间内探索出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新路。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至今仍然有效。

一是站稳倒作立场，这直接决定了情感的基础。决战时刻，是生死考验，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倒下去，他们最后告别时的一个眼色、一句嘱咐，都给活着的人留下特殊的、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一切，现在都要由活下来的人单独承担回忆和描写的重任了。作者对于革命烈士的描写，描摹出了庄严、神圣的革命情感——这是文学作品不可替代的地方。尽管影视作品更具感染力，但现在很多影视剧表现不出这种内在的神韵，是一种遗憾。比如许云峰为了掩护同志们脱险，他迎着敌徒走去。成岗承受了一切酷刑的考验，当敌人提他出狱的时候，他以为是赴死刑，坦然无畏地向许云峰告别说“老许，我先走一步。”江姐面临死刑时候的从容，庄严……都体现了这些革命者英勇牺牲的特点。他们为了伟大崇高的事业去牺牲，在别人看来是壮烈的、崇高的，而他们自己却视为平常，表现得极为平易。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精神，但却不易在影视作品中体现，一定要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用心去体悟。

又比如，《红岩》里革命英雄的顽强精神，不只是表现在用肉体去抵抗敌人的酷刑上，而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了真正精神上的顽强：这种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清醒的革命头脑是连在一起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革命的事业和自己应尽的义务，都保持清醒、冷静的思考。比如华子良装疯，是罗世文在赴刑场的路上冷静布置的。即使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神态清醒、镇静如素。这是一种超凡的顽强意志的表现。很可惜，现在很多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由于作者达不到这种思想与精神境界，因而写不出这么感人至深而又催人奋进的红色经典了。

二是对现实的深刻把握，特别是对各种关系的整体把握，直接影响了作品的结构、表现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即在于：作为一个作家，是“能够抓住一个人的总的特点，并且用淡淡的三两笔，勾画出他的内在的本质来。”他不是用外在东西迷惑读者的眼睛，相反，要赋予读者一双慧眼，看清事物的本质。《红岩》描写上的简洁与作品人物的行动性强是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从不需要自己出来介绍他的人物和环境，人物是通过自身的行动展示自己，环境是通过人物的眼界、感受表现出来。比如许云峰对敌人的冷嘲，江姐素爱整洁的习惯，以及龙光华对自己军衣的酷爱皆是如此。

三是人物的逻步丰富，是文学典型形象创作的必由之路。《红岩》描写的这个革命集体，不是用一个城市的地下组织可以包括的。这就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编辑张羽特别提出要他们学习《青年近卫军》和《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又比如战士龙光华从一个“受人照拂的病友”，到一个“保卫难友利益的战士”，最后成为一个搏击敌人、死不倒下的英雄的动人形象这种神来之笔，也说明了在作者思想发展之后，审美情趣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因而从这个普通战士身上，开掘出闪耀着夺目光辉的革命精神，使他成为来自武装斗争战线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普通战士的光荣代表。

《红岩》问世后，新华社、《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媒体都加以报道和推荐，曹靖华、华罗庚等均先后打来电话表示赞赏和祝贺。北影、长影、天马等电影厂纷纷派人来联系拍摄电影事宜。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不仅仅在国内，该书很快销往英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古巴、巴西等许多国家，皆获得很高评价。红色经典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是相当巨大的，这在今天仍不能忽略。

“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在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一席话，打动了亿万观众，也打动了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宜，那一瞬间，她泪流满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小宜说，她被张桂梅深深感动，要送她一本自己珍藏多年的《红岩》，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她父亲的印章。

对于一件成功的事情，我们可以总结的太多了。可以从结果找原因，可以从现象看本质，也可以从流溯源，以校寻本。如果让我们总结究竟做对了什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在有《红岩》的历史作为参照，更能看出事物的本真来。从《红岩》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一本好书的出版，要求编辑始终在现场，和作家、读者在同一个现场、同一个时代。好作品需要时间的积累，绝不能急功近利。

（作者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级巡视员）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初版本

我们要记住罗广斌

□张玉清

11月27日，是重庆“11·27大屠杀”纪念日。75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志等近200人被杀害，仅罗广斌等34人冲出牢房脱险。三天后，重庆解放。

罗广斌脱险之后，忍着巨大的悲痛，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每天晚上一刻不停地伏案疾书。在脱险后的第28天，写出了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狱组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正是这份报告，最真实地记录了红岩英雄群体在狱中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多年以后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部珍贵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与另外两名狱友刘德彬、杨益言合著发表了狱中斗争回忆录《圣洁的血花》和《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红岩》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轰动，至今发行二千多万册，成为了爱国主义教科书。正是经由《红岩》的传播，江姐、陈然、许晓轩等烈士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在人们心中永不磨灭的英雄形象。在重庆当地，“江姐”这两个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烈士的名字，而是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词语。当人们想说一个女性性格坚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坚守自己内心的主张、不轻易妥协和苟同、具有独立的人格，就会这样说：“她这个人很‘江姐’。”一个人的名字能够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比喻，这里面是有着多么大的人格力量啊。

几年前，为了写一部弘扬红岩精神的作品《一片井心向阳井：红岩故事》，我阅读了二百多万字的党史资料、烈士传记、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类相关档案，对红岩英雄群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曾在后记中说红岩英雄们让我每每思之动容，我非常期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为他们作传，其中罗广斌就是我最想为其作传的英雄之一，因为他是让红岩英雄事迹能够流传后世的最为关键的人物。

罗广斌是重庆忠县人，1924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家境富有，在乡下有田产，在成都有房产，父母为大学教授，大哥罗广文是国民党兵团司令，陆军中将。他自小被父母溺爱，没有吃过苦，过的是富人家里的少爷生活。但罗广斌性格叛逆，当他进入青春期后恋爱受到家庭的压制和阻碍，便奋起抗争，离家出走追求自由，与地主官僚家庭决裂了。著名作家马识途家与罗家是世交，马识途大罗广斌九岁，罗广斌深受马识途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成长为进步青年，马识途渐渐成了罗广斌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

1947年秋天，罗广斌参加了由重庆市委领导的与《挺进报》并行的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1948年3月，由江竹筠、刘国志做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农村工作。1948年9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先是关押在渣滓洞，后来因为给狱入狱的同志写信通报消息，被特务发现，于是转押到白公馆。

罗广斌刚入狱时，并不是像陈然、江姐他们那么镇定自若，他的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到“完了”“度日如年”，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也没有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念头。但他本质好，头脑中一片混乱时，还记得马识途对他说过的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因此他下定了决心不影响任何朋友。在敌人审问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后来他在江姐牺牲中间态望真不屈的行动感染下，逐渐地坚强起来，在狱中有了优秀的表现。罗广斌受到的最大的考验是，他牢里几次尝救他，特务头子徐远举答应只要他答应“停止政治生活”写“悔过书”，就可以放他出去。但是罗广斌都坚决地拒绝了，他表示绝不屈党，绝不玷污自己的信念，绝不玷污党员的纯洁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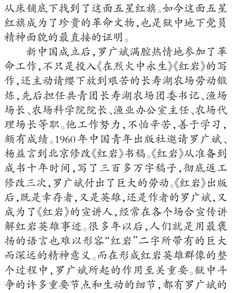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他写了一首诗。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须要自白。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绝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样地爬出去，
我很熟那些伯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须要自白！

后来罗广斌就是在这首诗的基础上，根据陈然平时与他谈心时的思想交流和陈然的心愿，在《在烈火中永生》里替陈然写出了那首著名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当初罗广斌被捕的时候，特务头子徐远举曾亲自到茅干六英国公馆面请罗广文示下，罗广文说：“我这个弟弟不听话，关关他也好，但不可伤了他性命”。最初罗广斌在狱中受到诸多优待，不上手镣脚铐也不受刑，还曾被狱友们劝疑为奸细。后来因为罗广斌经常与特务英男斗争，也被特务动了刑，罗广斌常着伤挑着手镣脚铐回来，却大感欣慰，喜形于色对狱友们说：“我终于跟你们一样了！”有一次罗广斌的家人太想他了，要求特务头子把他释放接回家里，他在家里吃了顿饭，洗了个澡，却又坚决地主动回到了狱中，见到了狱友们，他喜气洋洋地说：“我又回来了，跟大家一起继续战斗。”他的率真和对革命的赤诚热情，赢得了狱友们真心的喜爱和尊重。

罗广斌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个监狱都关押过，对这两处狱中的斗争情形和被关押者的表现都了解。他向陈然讲述了江姐在渣滓洞坚贞不屈的斗争情形，“毒刑、铐镣是太小的考验！”“孩子不行，拿刀子来！”江姐的这些话经由罗广斌的转达，又鼓舞着白公馆这边很多的同志顶住特务的酷刑逼供，与特务们做坚决的斗争！陈然心有所动：“广斌，将来，你写一本书吧，把江姐写下来，把许建业写下来，这能教育和鼓舞更多的人，也会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对，把咱们与敌人做斗争的经过写下来，把你了解的都写下来，把叛徒也写下来……”陈然的话成为罗广斌后来写作《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的长期的动力。



《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2月初版本

以许晓轩、谭沈明、陈然、刘国志、罗广斌等为核心成员的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总结出了地下斗争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众多被捕者在狱中的表现，形成了“八条意见”。狱中党支部希望把他们总结的“八条意见”向党汇报，作为我们的党在未来工作中的参考。因为罗广文的关系，特务不会杀罗广斌，他是最有可能活着出去的人。在阴沉昏暗的白公馆牢房里，陈然对罗广斌说：“广斌，这个条意见，你要心里记牢，咱们这些人只有信能有希望出去，把这些意见转交给党，可就全靠你了。”罗广斌成为狱中党组织把“八条意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的最合适人选，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党支部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多次讨论。罗广斌把这一份无比珍贵的材料牢记在心里，在红岩地下斗争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白公馆的难友们在欢庆时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激动、狂喜，流泪！我深了，大家的心情仍在澎湃着，毫无睡意。罗广斌内心忽然灵光一闪，他无清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五星红旗冲出牢门去接解放！”一语提醒了大家，罗广斌、陈然、刘国志等立刻行动起来。罗广斌扯下了自己的红绸子被面儿做红旗，陈然拿出自己的白布衬衣做五星图案，没有针线，他们用制饭铝五星贴在了红绸子的背面上，终于做成了一面五星红旗。罗广斌脱险之后的第二天，他回到白公馆，从床铺底下找到了这面五星红旗。如今这面五星红旗成为了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狱中地下党员精神面貌的最直接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不只是投入《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的写作，还主动请缨下放到艰苦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先后担任共青团长寿湖农场团委书记、渔场场长、农场科学院院长、渔业办公室主任、农场代理场长等职。他工作努力，不怕辛苦，善于学习，颇有成绩。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修改《红岩》书稿。《红岩》从准备到成书十年时间，写了三百多万字稿子，细致逐工修改三次，罗广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红岩》出版后，既是丰收者，又是英雄，还是传奇的罗广斌，又成为了《红岩》的宣讲人，经常在各个场合宣传讲解红岩英雄事迹。很多年以后，人们是用最袁扬的语言也难以形容“红岩”二字所带有的巨大而深远的精神意义。而在形成红岩英雄群像的整个过程中，罗广斌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狱中斗争的许多重要节点和关键的细节，都有罗广斌的参与，罗广斌是与陈然、江姐、许晓轩、刘国志等最典型的红岩英雄密切接触最多的人，如果没有罗广斌，红岩英雄群体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形象，有可能会被埋没。

令人扼腕的是，1967年2月罗广斌逝世，终年43岁。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还能挖掘出红岩英雄更多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细节，他的去世令人痛惜！

（作者系作家）

罗广斌的仿宋字

□钱振文

2005年春节过后，王扶介绍我认识了张羽的夫人杨桂凤。当年，张羽是《红岩》的责任编辑，王扶也曾参与过《红岩》的编辑工作。

我到杨桂凤老师家的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总之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刚开始，每天下午看完资料后，从东四十二条回人民大学，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虽然穿着棉衣，也还是感到寒风刺骨。我看资料的地方是杨老师家的书房。书房是阳面的一间大屋，这间屋子的东墙放满了书柜，书柜外边有个很大的桌子，桌子两边都有抽屉，杨老师特别给我办好两个桌子，说是当年撰也牧用过的。

书柜上面几排没有门，看到了不少好书，比如《红旗谱》的精装版。出版社编辑的家里有不少好书，这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对我有用的和《红岩》有关的资料都在书柜最下边，两扇门的里边。这些资料多是单篇的文件、信件和稿件，不容像书一样整齐地立在书架上，只能一件一件堆放在一起。看这些资料比看书要复杂和艰苦得多，主要原因是这些资料大多是手写的，每个人的字体和运笔习惯很不相同，需要慢慢熟悉后才能游刃有余地看下去，有些潦草的字需要仔细辨认很长时间才能恍然大悟。

就是在这个手稿的海洋中，我发现了罗广斌手写的两份文件。一份是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所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残稿，这份残稿是整个报告的第三部分“狱中情形”和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其中的“狱中意见”共八条，后来人们把它的内容精简为“狱中八条”。精简后的“狱中八条”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第二份文件是1964年1月8日写给北影厂导演水华和演员于蓝的信。信的内容是向水华他们转告重庆市市长任白戈对电影剧本《烈火中永生》的意见和重庆市文联组织的座谈会上剧作家席明真等人对剧本的几点看法。信的落款是三个人“德彬 益言 广斌”。但可以肯定这封信的执笔者是罗广斌，因为这封信的字体和《狱中情形报告》的字体是完全一样的。

罗广斌的字很独特，笔画细小、简单、清楚。俗话说“字如其人”，但罗广斌的字却和他的性格没有关系。如果你了解了罗广斌的性格，就更会觉得不可思议。曾经引导罗广斌走上革命道路的马识途在一篇回忆罗广斌的文章中说，罗广斌“是一个很不安生的青年，入家说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活蹦乱跳的，连头发梢都不那么安分，老是耸起，并且摇来摆去”。罗广斌过去的战友陈家俊曾对张羽说，罗广斌有两个绰号，一个叫小猴，一个叫跳蚤。跳蚤的意思就是他总不安分，总在跳动。按照“字如其人”的逻辑，罗广斌的字就应该是龙飞凤舞、挥洒自如，但看起来，他的字却非常稳定、安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羽曾经计划写本罗广斌传，为了写作传记，他曾经先后访谈过马识途、陈家俊等罗广斌当年的战友。陈家俊是当年罗广斌在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的同学，也是后来在秀山中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战友，人们普遍认为她是《红岩》中成熟的原型。在1991年5月23日的访谈中，陈家俊向张羽介绍罗广斌在西南学院时的各种本领，其中之一就是刻钢板，说罗广斌的钢板“刻得好，细，小，清楚，用墨针磨后写，比钢笔还细”。就是在这次访谈中，陈家俊的爱人向洛新补充说，罗广斌的才能还有的宋字和刻图章。

看来，罗广斌的字和他的革命经历有关。罗广斌的字体应该是来源于刻钢板，是刻钢板时常用的的宋体。仿宋体的特点就是庄重规范，以表达内容为主要目的，与刻写者的个人性格无关，不容易从字体辨别写字人，这种特点使它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

除了刻钢板，陈家俊还介绍了罗广斌其他的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的“雕虫小技”，“雕虫小技”是马识途的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贬低罗广斌，而是对罗广斌“非凡的聪明”的赞叹。这些“雕虫小技”在那个年代的革命活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壁报制作，壁报大概类似后来的大字报，陈家俊说，在西南学院的时候，罗广斌负责壁报刊头设计、排版制作，罗广斌设计的壁报风格多样，生动活泼。比如他设计了一种有鱼鳞纹的花边，是拿一根香点燃一条二指宽的纸条，一烧，白色的报纸变成了咖啡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贴到壁报的边上，看起来古色古香。除了刻钢板、画壁报，罗广斌还擅长摄影、跳舞、游泳、打桥牌、打排球、打乒乓球，制作小型飞行器、制作书签，甚至在做汤团、做皮蛋、做酪糟这些生活小事上，罗广斌都有独到的经验。

罗广斌的许多革命经历出现在了《红岩》中，包括编壁报、刻钢板。陈家俊在访谈时对张羽说：“每一本书，不把自己当成英雄人物，做模特儿写进去，并不等于把作者的生活经历抛到九霄云外，不反映在书里面，不太可能。写成瑶在重庆大学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西南学院经历过的事，也是罗广斌亲身经历过的。”

《红岩》一开始，就出现了刻钢板。第三章，负责印刷《挺进报》的地下党员成岗又学会了刻钢板，希望江姐把刻钢板和油墨印刷两道工序都交给他完成，这样就不用提心吊胆，害怕在刷印时不小心撕破蜡纸了：

成岗还有第三条理由，那从他第一次印刷失败，撕破了蜡纸时起想到了的：除非他自己会刻钢板，否则不管怎么会印，也总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从那时起，他便决心练习刻钢板。现在他已经学会了，而且刻得由一手方方正正的仿宋字。

“你的意见是交给谁来干呢？”江姐意味深长地问。

“交给我吧。我学会了刻钢板。你看，这是我刻的仿宋字。”成岗一面说着，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蜡纸，上面刻写着精细的字迹。

第五章，地下党领导李敬原夜宿成岗家，提出帮助成岗刻一张蜡纸。在为成岗示范了刻钢板的更高明的方法后，李敬原说到了罗广斌用刻针制作的铁笔：

“这种铁笔不好，没有钢火。”条敬原摸摸那已经被钢板磨得锐尖的笔尖，“用留声机的唱针来做铁笔，钢火好得多，写的字笔画更细，更清楚……你试一试，只要稍微磨一下就成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院研究馆员）